



上海大学社会学文库

主编 / 张文宏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 现代人类学简论

马丹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借



上海大学社会学文库

主编 / 张文宏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 现代人类学简论

马丹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现代人类学简论 / 马丹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619-0

I. ①两… II. ①马… III. ①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011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莎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340 千字
定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现代人类学简论》起初是以人类学自编讲义的形式在教学中累积、探索，后来修订为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断代史”，笔者需要在“前言”对理论体例的内容结构进行简要的说明。

导论是由三部分组成：一、人类学史的分期多样化。二、人类学史的分期问题。三、选题说明。对理论史的文献梳理，也是对中国人类学自学科恢复以来投入的人类学概论教材的回顾和总结。1980—2010年期间，人类学概论编写不辍，推动了人类学的学科繁荣，促进了理论的交流与传播。笔者发现，人类学理论史的历史分期在诸多教材和专题著作中有多样化的呈现，在这多样化的历史分期思路的背后展现的是中国人类学对理论范式的主观选择，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相互作用，给理论史的书写打上了中心与边缘的烙印。正如孙庆忠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评论所说：“这部著作既是一部中国人类学家视野中的人类学学科史，也是一部评价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论说集。”^① 在分析理论范式与理论学派的关系构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且将这一问题意识贯穿于“断代史”的书写实践中，论述战争与现代人类学的关系议题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介绍原始社会的哲学起点。这些哲学思考流露了文化比较的端倪，将他者构建为理想国，对自己的社会进行批评并构想改革蓝图。和法国的启蒙思想略有不同的是，凡伯伦对掠夺阶级的想象和有闲阶级的思考，与当下活跃的文化意义的阶层具有理论的启发价值。凡伯伦指出掠夺阶级和作业阶级的区分，可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得到观察。

^① 孙庆忠：《黄淑娉评传》，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英国人类学以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和贝特森等师生人物为例，分别论述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一理论整理工作并不完全是重复前人的功能-结构主义内容，坚持以“我注六经”的方法，得出英国功能-结构主义的理论阵营的文化理论与哲学相互援引的新发现。功能-结构主义的内部反思的思潮从功能-结构主义的旺盛时期就已开始，从贝特森、埃文斯-普理查德和利奇等人出现的理论新综合的方向就已开始。根据亚当库伯的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主要的人类学家中，利奇的著作被引用高居榜首。整个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的发展几乎全被利奇等人所左右。^① 利奇之后，功能-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和理论阵营走向衰退，英国人类学的格局处在变动和调整中。

法国人类学指的是法国社会学派到结构主义的演进，社会意识向无意识转换。结构主义以“冷社会”的史诗篇章开启了象征人类学与实践论的“小时代”叙事，同时也激发了格尔茨重振艺术、宗教与仪式支撑的相对主义世界观的进取心，格尔茨发现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现代性诉求和民族情感、共同体以及传统的象征主义仍旧深深地连接在一起。在结构主义围绕的复杂的学术对话关系中，笔者仅选取利奇、玛丽道格拉斯和特纳，论述他们与结构主义的渊源与区别。

美国人类学在它的草创时期流露的无畏和勇气至今仍为人称道，虽然对历史特殊学派的批评不绝如缕。对于中国人类学而言，由于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创立的理论根基，美国特殊学派对进化论的批驳、挑战使其在理论史的书写位置一向平平，甚至被贴上了“进化论的反动学说”标签。这些不公平的批评不会抹杀博厄斯对种族主义的抵制和否定在“纳粹”阴云笼罩时期焕发的人文光彩。重读他的《原始人的心智》，体会他树立“文化决定论”信念的决绝和论证“文化决定论”的严谨科学态度与方法。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继承了博厄斯的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例如本尼迪克特对“濡化”的精湛论述，米德对未来的不确定与文化选择同在的“向前看”面向。他们继承了博厄斯相通的学术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德尤为瞩目，她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青年亚文化融合，看到全球化的扩张力量正在摧毁人类学的“孤岛”

^① 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实验室,消费社会鼓吹的同质性和标准化逻辑亦毫不留情地破坏文化多样性。从当代人类学的认同危机出发,米德表达了人类学应对深刻改变的田野状况的自我改变与文化构建力量的坚定信念。

结语对生于战争忧患、又在战争中成就的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影响与现代人类学先驱在“科学民族志”范式下通过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收获的优秀民族志品质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评论。按照中国人类学教科书的习惯,西方人类学理论史介绍完毕,中国人类学史就是题中之意。对于学科恢复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大多数教科书的论调是成就斐然而前景无限。孟航评价道:“近年来,虽然对外交流越来越多,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却仿佛依旧孤悬在国际人类学界外,并未真正与国际接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对西方人类学不够了解,或者说认识不足、把握不透所致。因此,唯有真正认识和把握了西方人类学的本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够找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①

这种危机意识也伴随着中国人类学学科的乐观发展但是理论自信不足的焦虑蔓延开来。寻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在理论范式的选择上呈现出巨大的分歧与分化。自“人类学本土化”或者“人类学中国化”的学科共识于2007年分化瓦解之后,中国人类学进入了多样性的理论格局,分支学科发展之快超过了教科书编写和吸纳的速度。^②学者不同程度地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试图从认识论层面“重新把握”中国人类学愈合分化的整合力量,同时也在“产出”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占据一席之地的“中国特色”的理论资源。周大鸣认为历史是中国人类学的突破路径。蒋立松致力于理论应用于西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的经验对接与转化。黄剑波试图从哲学根源探索中国人类学的道德和宇宙观资源。和少英建议以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为理论参考,作为中国人类学实践的理论指导。伴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中国人类学在思考是以“文化大国”还是经济、科技大国的身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经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伴随人类学百年的

① 孟航:《西方人类学发展史的再认识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在“他者”中理解“自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64页。

② 马丹丹:《1995年: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拐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发展历程，同样面对中国人类学的当下处境——有着历史特殊主义、功能—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优良传统的中国人类学开始进入弗里德曼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唯物与唯心之争，这一老问题依旧如“幽灵”一样造访、干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选择。

目 录

导论	(1)
一 人类学史的分期多样化	(3)
二 人类学史的分期问题	(29)
三 选题说明	(33)
四 国别人类学的介绍	(36)
五 同时期人类学家对战争的回应	(42)
六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现代人类学的特点与影响	(50)
七 参考书说明	(53)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哲学起点	(55)
一 卢梭	(56)
二 孟德斯鸠	(62)
三 《有闲阶级论》：制度学派对原始掠夺的讨论	(71)
第二章 英国人类学	(84)
一 马林诺夫斯基	(88)
1. 库拉圈的流动与仪式	(89)
2.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	(96)
3. 马林诺夫斯基与弗洛伊德的对话	(100)
二 拉德克利夫 - 布朗	(117)
1. 学术背景与基本主张	(117)
2. 宗教与社会	(123)
3. 比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130)
三 格列高里·贝特森	(136)
四 埃文斯 - 普理查德	(145)

1.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150)
2. 《努尔人》的豹皮酋长与贵族	(156)
3. 《论社会人类学》与神圣王权	(163)
第三章 法国人类学	(175)
一 涂尔干	(179)
二 莫斯	(189)
1. 莫斯论身体技术	(189)
2. 原始分类	(192)
3. 论馈赠	(194)
三 列维 - 斯特劳斯	(196)
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列维 - 斯特劳斯的 早期思想脉络梳理	(199)
2. 利奇的反叛《缅甸高地诸政治制度》	(238)
3. 象征人类学与列维 - 斯特劳斯的对话	(247)
4. 从结构到意义, 从转喻到隐喻——《嫉妒的制陶女》	(267)
第四章 美国人类学	(272)
一 博厄斯	(275)
1. 博厄斯的学科贡献与学术影响	(276)
2. 从《原始人的心智》重温文化的概念	(282)
二 露丝·本尼迪克特	(290)
三 玛格丽特·米德	(297)
1. 为选择而教育——《萨摩亚的成年》	(297)
2. 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	(304)
结语: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人类学的影响	(310)
参考文献	(316)
后记	(325)

导 论

特定时期的人类学理论反映出外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类学家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与现代人类学的密切关系的考量,笔者选取断代史的方式写作现代人类学,在人类学史的写作体例中并不多见,一般的做法是以长时段的方式对人类学史进行分期介绍。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现代人类学大致属于19世纪末期进化论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之间的位置。这样的归类对于人类学史已有的分期观念并未提供多少新意,笔者尝试通过现代人类学的专题研究增加人类学史的写作维度的丰富性。人类学史的分期首先就成为人类学史的写作要面对的问题,它涉及学者对人类学史的把握和理解。在国内的诸多人类学教材中,人类学史的分期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格局。

从黄淑娉、龚佩华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能够大致看到她们撰写人类学史的时候面对的客观困难和理论框架选择的局限。^①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全盘否定。出于重新了解西方人类学理论的需求,吴文藻、杨堃等人类学前辈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介绍就成为宝贵的资料来源。除了人类学理论的介绍,还有新中国成立前费孝通、杨承志、李安宅、吕叔湘等人对人类学著作的翻译,例如《文化论》《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初民社会》,亦成为教材著述的参考资料。黄淑娉在接受徐杰舜访谈的时候,曾回忆吴文藻对她的影响。

^① 黄淑娉、龚佩华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1版于1996年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到了2004年已经是第3版,一直以来被多个高校列为人类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目,非常受欢迎。

吴文藻晚年带研究生，着重研究西方人类学理论，我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受到吴先生的许多启发，经常向他请教。有一次，我向吴先生提了一些问题，他记下来，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再来。他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拿出九张卡片给我讲，我在一旁记笔记，这使我很感动，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至今读到吴先生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时阐述西方人类学的文章，我还很佩服他为什么那时就能把问题说得那么清楚。^①

从事民族学调查和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切断和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对话与交流，因为研究对象总有重合，尽管西方人类学常常被作为批评的靶子，不过也反映了民族学者不得不注意到利奇对景颇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婚姻理论。在《民族学概论》中，林耀华用高度概括的语言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流派”。与之相对照，林耀华将“经济文化类型”作为重点章节进行扩展，并大力提倡民族学的应用与现代化。黄淑娉将人类学理论方法作为一本专著来对待，这充分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的人类学研究条件得到恢复，逐渐向人类学的理论本体回归。在访谈中，她披露了自己从事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学科训练渊源和“异文化”田野调查的积累。

50年代起，我一直想着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结合当时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给自己立下了研究方向：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原始社会史；三是人类学理论方法。民族文化是比较贴近实际的，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有很多机会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原始社会史呢，当时人类学被撤销了，民族学受批判，原始社会史研究学前苏联，早期文化人类学理论是在对原始部落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到了世纪末回顾过去，尽管在各种政治运动干扰下，我想走的学术之路很坎坷，大体上还是坚持在既定的范围内做我原来想做的

① 徐杰舜问/黄淑娉答：《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事情。^①

作者明确表达从事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真实动机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和龚佩华合作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反映了我们关于研究人类学必须重视学习理论、更要联系实际进行田野调查的认识。”^②

黄淑娉等人写作《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时期，人类学论著还没有系统翻译过来。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有限的翻译资料和英文原典的基础上精准地把握了人类学理论流派的主张和特点。不过局促的翻译状况和学术交流的闭塞，还是限制了他们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了解程度。

随着时间的演进，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著作被翻译过来，人类学教材从外国教材的引进到国内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也是日益增多，国内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对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队伍的培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③ 在诸多教材中，人类学理论史的分期问题呈现出多样化与相互交叠的状况，因此，笔者首先尝试对人类学理论史的分期问题进行讨论。

一 人类学史的分期多样化

“马文·哈里斯的《文化人类学》是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同类著作的第一个译本”。这是林耀华对《文化人类学》在“中译本前言”中所说的话。“文化理论的历史”作为该书的附录出现。哈里斯按照时间顺序对人类学理论史进行线性的介绍，分为：启蒙运动、19世纪的进化论、社会

① 徐杰舜问/黄淑娉答：《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黄淑娉：《从异文化到本文化——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02年。

③ 2007—2008年，周大鸣在组织中山大学人类学团队编写《文化人类学概论》的时候，在序言中对目前教材繁多的盛况进行了列举：“目前，国内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性著作已不下20个译本，较为流行的如威廉·哈维兰编写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有了第10版。科塔克写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多样性的探索》等，也都有了中文本。国内学者中，如黄淑娉、龚佩华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也再版了好几次，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等，这些著作都为本书的编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参见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历史特殊主义、传播论、英国功能—结构主义、文化人格学派、新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结构主义等。在这个线性的排列中，哈里斯把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新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类别，并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针锋相对。历史特殊主义是对 19 世纪进化论的批驳。其中，在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区别时，他说道：“文化唯物主义反对人类学必须隶属于旨在摧毁资本主义、进一步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运动。”^① 1980 年代末，哈里斯的大量著作被翻译过来，其原因和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的理论背景有密切关系。^②

人类学理论史的介绍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恢复伊始就已经在学界陆续介绍并撰写。^③ 1989 年，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出版。在序言中，童恩正描述了人类学教材编写的困难，“从 1978 年到今日，学术界尚缺乏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化人类学》”。^④ 《文化人类学》表达了拳拳爱国心，其写作用意从应用人类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联系中颇能彰显出来：“是奉献给在改革中历尽艰辛的古老的祖国的几点意见。”^⑤ 他描述人

① 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荣、高地译，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1 页。

② 1989 年，张海洋等人翻译的《文化唯物主义》出版。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同年，许苏明编译的马文·哈里斯的《人·文化·环境》出版。该书有大量的内容来自 1988 年翻译的《文化人类学》。该书同样收录了“文化理论史”，不过翻译的措辞略微不同。例如在 1988 年翻译的著作中，历史特殊主义是对 19 世纪进化论的批驳，1989 年的版本则翻译为“对 19 世纪进化论的反动”。措辞的性质如此不同，历史特殊主义的翻译和引介就增设了障碍。参见马文·哈里斯：《人·文化·环境》，徐苏明编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介绍大多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这些丰富的西方人类学理论资料与引进，为后来的人类学理论史专著的撰写培养了理论兴趣，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尤为瞩目的苏联学者 C. A. 托卡列夫的著作《外国民族学史》被翻译过来，在国内民族学界引起了较大的理论反响。该书的理论编写体例已经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民族学理论体系有了较大的变化，西方人类学理论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例如法国社会学派、美国历史学派、美国族体心理学派等。较早参与理论史介绍的学者大多是老一辈人类学、民族学家。吴文藻对二战后西方理论思潮的介绍，杨堃对结构主义的介绍，梁钊韬对美国历史学派的介绍，容观复对社会变迁相关文化理论的介绍等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从筹备到成立，先后出版了三期《国外人类学》（1980—1982），中南民族学院的刘孝瑜先生参与了大量的国外人类学理论文献的译介工作。具体的内容参见《民族学研究》、《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容观复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等。

④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⑤ 同上书，第 2 页。

类学在中国中断二十多年后陷入的学术困境：“对于人类学急剧发展的新成就、新观点、新方法茫无所知或知之甚微。”基于此，他对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进行了介绍，大致列举如下：一、早期进化论学派；二、历史特殊论学派；三、传播学派；四、新进化学派；五、功能主义学派；六、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七、新民族志学派（认知人类学）。在理论流派的时间关系处理上，童恩正将历史特殊论学派与传播学派列为平行关系、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与新民族志学派列为平行且相近关系。同时，他还将历史特殊论学派、传播学派和功能学派看作是进化论的补充理论。他引用马林诺夫斯基 1954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巫术、科学与宗教》介绍其功能主义观点，对功能—结构主义的历史视角的缺失、相对静止的理论模式提出批评。此外，他还看到了新进化论对传播学派的文化接触、文化适应观点的吸纳。^① 他看到结构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也尤有前瞻性。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十分强调人类先天有心智能力去整理分类经验世界，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他的理论与唯心主义等同起来，因为他还是坚持文化是由社会的及物质的环境所造的，不过创造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心理性质而已。^②

对于童恩正的这一观点，其他学者也有异议。例如杨堃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他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伯格森的唯一论等捏合在一起……在理论上，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仍属于唯心主义学派”^③。面对唯心主义的指摘，列维-斯特劳斯用三个反问句为自己辩护：“我为什么选择作人类学家而不是继续当大学学业为我确定的哲学家？为什么我的著作关注那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志细节？为什么我尽力准确鉴别每个社会都认识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各自的技术用途、可食用物种的不同制作方法——煮、蒸、烤、炸，或风干后熏制保存？”^④ 可见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意识形态的批评不如通过

①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 页。

② 同上书，第 34 页。

③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2 页。

④ 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邢克超译，中国人民大学 2014 年版，第 165 页。

原著了解作者的具体观点和真实态度,从而建立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样的方式来得朴素。当然,不能以今天的知识状况来论断 20 世纪 80 年代,反而应该看到中国人类学前辈筚路蓝缕、开创西方人类学理论引介道路具备的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理论积淀。从吴文藻、杨堃、林耀华、陈永龄、戴裔煊等老一代人类学、民族学家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译介与梳理,到童恩正、黄淑娈、周大鸣、夏建中等人对人类学理论教学使命的承担与传递,可以说从事人类学史研究的两代人的学术梯队已经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

对于如何对待西方人类学的诸多理论,童恩正指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用最新的科学武装自己,在实践中形成正确的、科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①这一表述和现代人类学对科学的文化理论的信念是一致的。笔者以为,西方人类学开始对科学的反思并汇聚为民族志反思的理论思潮,会帮助中国人类学者反思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范式,这意味着中国人类学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仍旧是在认识论层面。^②有意味的是,帮助中国人类学者反思的理论工具却有可能是表征危机以来所批判的文化理论。

王海龙与何勇合著的《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思潮中酝酿而来,这两位作者与美国人类学同行有了接触和交流,在资料的前沿性和渠道上略占优势。当时苦于没有系统论述差异性和复杂联系的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现成论著,于是“坚定了写作此书的决心”,致力于西方人类学的源头、渊源流变、思想发展和科学意义。^③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现代人类学理论史和当代人类学的理论走向,以 20 世纪 60 年代为现代人类学与当代人类学的分水岭。其中,现代人类学的理论流派包括进化论学派,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传播论学派,历史特殊

①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 页。

② 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反思是循序渐进的,而且语气是相当缓和的。例如王庆仁在一篇理论文章中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包括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无疑是正确的。”接下来口气一转:“但是,‘指导’并不等于‘代替’,因为包括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和研究方法。”伴随着这一语气的缓解,强调田野调查的功能—结构主义受到了推崇,学科地位大大上升。参见王庆仁:《21 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民族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46 页。

③ 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2 页。

学派,功能—结构主义,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新进化论。当代人类学的理论走向如下:1950—1960年代人类学是理论创新和革命的时期:1. 认知人类学;2. 符号人类学;3. 新功能主义。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占据主导地位,分别表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派。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走向实践论和行为论。马文·哈里斯在《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接近何勇所说的“新功能主义”。何勇将新功能主义定义为“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强调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协调、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功能”。^①林耀华评价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是新进化论、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折衷理论。^②较之以往学者的划分,该书跟踪了新进化论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动向,例如探索生态系统与人群单位互动关系的新功能主义;符号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催生与发展,较早介绍了特纳和格尔茨的理论观点;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动向,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象征符号和经济基础之间做出的缓和与调和,提及沃尔夫、陶西格和施奈德的研究成果。^③该书将人类学理论的历史分期的下限延伸到当代。作者介绍现代人类学的时候,倚重苏联民族学家托卡列夫的《外国民族学史》,例如托卡列夫对博厄斯理论贡献的肯定,对功能—结构主义的介绍,对怀特的新进化论的观点的介绍。在论述结构主义的时候,引用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的观点,介绍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中的观点。

从王海龙与何勇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的介绍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它包含了唯物与唯心之争,“软”文化与“硬”的物质、经济基础的转移,意识形态与生态环境、经济作业方式的决定论之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似乎占据了作者的注意力:“80年代的行为论深受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将对90年代的人类学产生积极的影响。”^④

① 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② 林耀华:“中译本前言”,载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荣、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③ 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④ 同上书,第401—402页。

林耀华在《民族学通论》对西方民族学流派有着言简意赅地概括。在这里，民族学与人类学是等同的，可以相互替换。与黄淑娉感到的困惑：“建国以来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全盘否定”有一定联系，但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切进步思想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和排挤，而西方民族学反而占了上风。”^① 林耀华对西方人类学史的评价亦以马克思主义为准绳，马克思主义受到压制是其他理论学派百花齐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然。

西方民族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进化论学派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从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民族学大发展时期，出现的流派有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是西方民族学大变化时期，出现的学派有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新心理学派、社会生物学学派等。^②

林耀华写作理论流派的方式通常以概括性语言为主，很少引用原典。其中，文化相对论学派、新心理学派和社会生物学学派的介绍在其他的人类学史的分期当中较少见。在介绍功能学派的基础上，林耀华引入了人类学中国化的早期成果：如《江村经济》和《金翼》，并引用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对这些著作的评价与肯定，以及他对吴文藻的“人类学中国化”的肯定。他还讨论了人类学中国化的三种路径和态度，对于不同于吴文藻主张的看法，他并不轻易地加以褒贬或者否定，“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性”。^③ 林耀华指出中国人类学从发轫开始就和历史紧密结合，注重历史调查与社会调查，这是西方人类学的方法论所不足的。黄淑娉总结道：“历史研究与现状调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民族学通论》的初版是在 1990 年。

② 同上书，第 117—118 页。

③ 同上书，第 145 页。